

# 跨越、连接与交融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以四川巴塘汉藏共生关系为例

翟淑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强大的内生性生存智慧和丰富的实用性交往策略,各民族在竞争—冲突与合作—互惠之间不断博弈,形成了政治上的共识、生态上的共享、经济上的共利、社会生活上的共处、文化上的共融和心理上的共情。这个复合性共生体系是逐渐生成的,呈现了原本隔离状态下的不同民族群体如何跨越多重边界,实现多层次连接,并在共同生活中形成自然—社会—文化的融合交织格局。多民族复合共生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视角,而其动态性和生成性能够有效地将历史和现实加以关联。历史上各民族的共生智慧对于当下更高效和契合地构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以民族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复合性共生体系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23)01-0089-08

**DOI:**10.20076/j.cnki.64-1065/G4.2023.01.011

##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纵观历史,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内生性生存智慧和丰富的实用性交往策略,这源自各民族在竞争—冲突与合作—互惠之间不断博弈,在自然生态、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等方面逐渐凝聚成复合性共生体系。因而,从共生视角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成为一个可操作的重要切入点。

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de Bary)于1879年首次提出,指不同物种相互接触、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系统<sup>[1](28)</sup>。共生的核心是共存和共赢,其本质是系统内共生单元之间以及共生单元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方法论<sup>[2]</sup>。共生的重要理论之一“共生发源理论”认为共生会带来新物种,进而推动自然界的进化,这揭示了共生的过程性和生成性<sup>[2]</sup>。较早将共生概念及理论应用于社会分析的当属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20—30年代创立了人文区位

收稿日期:2022-10-12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民族地区旅游景观建构的人类学分析”(2021MZSN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利益共同体视角下的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研究”(19BMZ147)

作者简介:翟淑平(1982—),女,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藏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研究。

引用格式:翟淑平.跨越、连接与交融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以四川巴塘汉藏共生关系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

学(human ecology),研究城市内不同群体如何基于竞争、合作等关系形成共生格局。20世纪中叶以后,共生概念被不断地扩展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中国,胡守钧较早提出了社会共生论,系统地探究了社会共生的条件、机制、演变和优化路径等问题<sup>[1-12]</sup>。近30年来,以共生视角来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成果也逐渐出现。袁年兴明确提出民族共生理论,认为民族关系的本质是共生关系,并试图构建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sup>[2]</sup>。许宪隆以共生的动态性来分析中国民族关系的过程性,认为民族共生互补具有阶段性和递进性,最完善的状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一体化共生模式<sup>[4]</sup>。此外,围绕民族共生也不断涌现出角度各异的研究,例如,多民族经济共生<sup>[5]</sup>、民族互嵌和文化共生<sup>[6]</sup>、族际通婚与民族共生<sup>[7]</sup>、人口流动与族际共生<sup>[8]</sup>、民族共生模式和路径探讨<sup>[9]</sup>等。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从共生视角综合、宏观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成果,沈再新从共生空间、政治共生生态、经济共生生态、文化共生生态等维度探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共生思想<sup>[10]</sup>,刘勇从历史嬗变的视角提出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自在共生”到“自觉共生”的转变<sup>[11]</sup>。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川、滇、藏结合地带的巴塘县汉藏关系为例,将共生理论更细致地落实到具体的“人”的层面,分析历史群体的共生与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关联。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sup>[12](3)</sup>。也就是说,作为自觉实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政治身份确认密不可分,然而这个建构过程必须以自在的民族实体为基础。本文试图借助共生理论来解释该自在实体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形成机制,从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解析民族共生的多重维度,以期更清晰地理解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 二、多重边界的跨越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处于青藏高原南缘,金沙江中游东岸,川、滇、藏结合地带。自然环境的立体差异、民族群体的复杂往来,为巴塘积淀了自然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杂糅性,造就了藏族、汉族、彝族、回族、羌族、纳西族、蒙古族等多民族共存共居的历史与现实格局。自然、行政、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巴塘县的多重边界,而对边界的跨越则构成了民族共生的前提。

从地理环境来看,巴塘县地处横断山脉北端、金沙江东岸河谷地带,区域海拔落差大,垂直分异特征明显,高山河谷错落有致。巴塘城区海拔较低,开阔的平坝适于农耕,而四周海拔逐渐升高,从山地农业逐渐过渡到高山牧场。多样化的生态单元为不同民族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生计方式,为形成立体多元的经济共生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这种立体并不是处于静态和封闭状态,区域内的河谷、坝区、山地、牧场之间存在着纵向的交换关系,在跨区域的横向尺度上也存在着频繁的往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横向跨越因地理梯度的起伏而呈现出宏观层面的立体性,并且往往与区域内的政治流变有极大关联。

巴塘县的行政设置历经流变。早在战国时期以前,巴塘地区就有人类居住,周曰戎,秦称西羌,汉系白狼,唐属吐蕃,宋末归附元朝。明隆庆二年(1568年)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巴塘被云南丽江纳西木氏土司接管。明末清初,巴塘被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控制。清康熙三年(1664年),巴塘归西藏达赖喇嘛管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清廷派军前往平乱,途经巴塘时,将达赖喇嘛派驻巴塘的土官招降,设土司,自此,清廷正式管辖巴塘。雍正四年(1726年),清廷以宁静山为界,划清西藏、四川、云南界线,巴塘被划入四川。之后,为图西藏安定,清廷快速打通作为官商大道的川藏南线。雍正六年(1728年),在巴塘设置粮台、粮务委员,委派流官<sup>[13](6)</sup>。活跃的

政治流变给巴塘带来了多元的民族和文化。云南丽江木氏土司管理巴塘期间,曾将大量纳西族迁入,垦田种植,推动巴塘农耕技术的进步。蒙古和硕特部接管巴塘,带来了蒙古族及其文化习俗。西藏达赖喇嘛管理巴塘后,派来西藏土官及大量藏族属民,加强了巴塘与西藏的联系。清廷接管巴塘后,在军事、屯垦、贸易、文化等方面大力经营,为汉族、回族等群体进入巴塘打开了格局。

巴塘的汉藏交往也是基于上述自然和政治因素而展开的。汉族进入巴塘的最早记载见于《藏程纪略》:“至巴塘,气候温暖,地僻人稠,花木繁茂可观,且集市之所,内地汉人亦寓此贸易。”<sup>[14][12]</sup>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陕、川、滇三军前往西藏平息准噶尔叛乱,岳钟琪部途经巴塘,当时有些随军的汉族、回族商队留居巴塘。之后,随着清廷不断加强对西藏的控制,经营川藏大道南路,巴塘的交通和军事地位愈加凸显,汉族向巴塘的流入更加频繁。巴塘海拔相对较低、地势平坦、气候温暖,也是重要的生态因素。根据巴塘方志及档案馆资料记载,雍正五年(1727年),从陕、川、滇随驻防巴塘制营官兵来到巴塘的商贩、艺匠有40多人。乾隆年间,定居巴塘城区的外来户有30多家。经过康、雍、乾、嘉数代对川藏南线的不断经营,在巴塘定居的汉族已经有80多家。他们初到巴塘多从事商业、手工业,在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保留着较为明显的汉族习惯,当地藏族以“八十家汉商”称之<sup>[15][4]</sup>。清末,巴塘又迎来了一次汉族入迁高峰。1905年,清廷派赵尔丰前往巴塘全面推行改土归流,从内地招募大量的商人、垦户、工匠、士兵、文人,巴塘发生了全面变革,汉藏关系在业已形成的多民族交互格局中凸显出来,成为巴塘族际关系的主线。

巴塘成为多民族交融地带,形成多重的自然、社会、文化分野,其基础和前提是自然生态因素,其驱动力是政治因素,而最根本的能动性力量则是具体的民族群体基于空间的跨越、生态位的并接所展开的社会文化的连接与整合。内地的汉族与青藏高原的巴塘藏族原本在空间区位上呈分离状态,双方虽然基于生态位的差异,在历史上既有以茶马互市为主的经济交往,也有因朝贡、朝圣而发生的其他往来,但这“遥远的互动”必须依靠物品、人员等媒介,这种间接互动带来的社会文化交流交融,其广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本文所关注的巴塘汉藏关系是基于已经实现了多重边界跨越的具体群体,只有全面呈现他们基于共同时空展开的日常生活层面的交流和互动,才能真正厘清其中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展现民族交往的明朗局面。

### 三、社会生活的全面交融

当空间的跨越、生态位的并接完成后,外来汉族和当地藏族共处巴塘这片土地上,基于各自的生计方式开展经济交往,并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社会生活的全面交融。巴塘的“八十家汉商”多数来自四川、云南、陕西,少数来自河南、山西等地。四川和云南的汉族迁往巴塘是因为地缘便利,陕西等地的汉族则大多原先在康定一带经营行商,跟随军队或者商队到处游走,路过巴塘时被温暖的气候、低海拔、地势开阔等自然条件吸引,就由行商改为坐商,留居巴塘。外来汉族与当地藏族在经济交往、族际通婚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细微之处展开社会生活的全面交融。

#### (一)经济交往

虽被冠以“八十家汉商”之名,但汉族在巴塘的生计方式是多元的。有的商户从内地购入针线、茶叶、布匹、农具及其他生活用品在巴塘销售,再收购虫草、贝母、菌子等地方特产转销内地,也有泥瓦匠、木匠、铁匠、银匠、皮匠、裁缝,从事屠宰、餐饮、小食品加工等行业,他们就地取材,用自己的技艺进行加工再售卖给当地人。这些商户和当地藏族不断通婚,获得土地后,逐渐偏重农耕,把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入巴塘。历史上,当地藏族以牧业为主。明代丽江纳西木氏土司管理巴塘时迁入一些纳西农户,他们在巴塘城区及周边垦田种植,为当地的农耕技术奠定了基础。随着汉族

的不断到来,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和更广泛的作物被带入巴塘。巴塘早期作物限于芜根、萝卜、苦荞、青稞等,汉族带来了更多的品种进行试种和推广。到清末,这里已广泛种植葱、蒜、韭菜、芹菜、茄子、辣椒、茼蒿、各种瓜、豆等蔬菜,还引进了苹果、桃、李、杏、梨、葡萄、石榴、核桃等果树。

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巴塘汉族商人在生计方式上已经发生较大改变。从事农业的有24家,皮匠兼务农21家,木匠兼务农4家,银匠兼务农5家,裁缝兼务农3家,教师兼务农3家,通司(翻译)兼务农3家,务农兼任军政汉文师爷2家,务农兼厨师2家,务农兼营理发1家,务农兼从事屠宰业1家,酿醋兼务农1家,烤麦芽糖兼务农1家,守水磨兼务农1家,裁缝1家,木匠1家,补碗补锅1家,酿酒1家,专任县政府汉文师爷1家。专事务农和兼事务农的总计72家,约占总户数的90%<sup>[6]</sup>。可见,昔日“八十家汉商”的商业色彩已经变淡,他们最初专门从事商业(含手工业)与当地入互通有无,后来在生计方式上与当地藏族逐渐靠拢,彼此嵌合,这表明汉族和藏族在经济生活上的交融逐渐完成。

## (二)族际通婚

传统巴塘藏族等级分明,禁止平民和贵族联姻。初入巴塘的汉族经济社会地位较低,不仅与当地贵族有身份上的等级区分,更有内外之分带来的隔阂,因而他们最初主要与藏族平民联姻。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他们开始与当地藏族贵族通婚,外来男青年入赘并继承贵族家族财产的情况逐渐增多。此外,汉藏通婚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传统。结婚的礼仪习俗也逐渐兼顾藏汉两种传统。通婚家庭对子女的安排沿袭当地藏族的传统,如家中有三个男孩,一般长子承家娶媳,次子出门入赘,三子进寺为僧;如家中有两个男孩,长子承家娶媳,次子入寺为僧;如有更多的男孩,除承家娶媳和入寺为僧外,其余可各自入赘或娶妻另立门户;如有女无男,留一个女儿招赘,其余出嫁。

基于婚姻的共同生活使双方能够尊重彼此的节庆和仪式,礼尚往来愈加频繁。例如,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是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俗称燃灯节,巴塘藏族家家户户都要吃酥油和奶渣拌的面疙瘩,他们会送给汉族家庭一起分享。而农历腊月初八,汉族每家都要煮腊八粥,也会赠送给藏族家庭。这些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 (三)日常生活

经济交往和族际通婚是外来汉族在巴塘兴家立业、世代安居的基础,基于此形成的姻缘、血缘、业缘等关系又进一步促进汉族和藏族在日常生活中深入交往交流,具体表现在饮食、节庆、风俗习惯、禁忌、语言等细微之处。

从巴塘城区的饮食传统来看,汉族带来的影响颇深。例如,当地的日常饮食以面食为主,从锅盔、饺子、包子、馒头到制作工艺复杂的“猴子耳朵”“金丝冒面”“巴叉面”,再到果子、点心、月饼、花馍馍等,都做得非常精致,而这都是由汉族尤其是陕西人带到巴塘的。从节庆看,汉族传统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财神会、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等节日习俗被带进巴塘,与当地藏族的传统节庆如藏历新年、各多节<sup>①</sup>、念大经<sup>②</sup>、聂洼鲁<sup>③</sup>、燃灯节、佛诞日、神山祭祀等共同存在,其中的仪式环节和细微之处相互借鉴、彼此渗入,使巴塘城区的节庆仪式呈现杂糅状态。

巴塘的风俗习惯和禁忌也是汉藏交融的。现在春节期间,巴塘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汉文和藏文的都有,若老人去世,三年内不贴红色对联,只贴白色、黄色、绿色哀思对联。巴塘人的婚丧嫁娶也兼顾藏汉两套仪式,而繁多的日常禁忌更是不分彼此。例如,正月初一忌扫地,免扫掉福气,忌向

①各多节也叫各多法会、破九节,主要是抛洒驱魔送祟的食子(用糌粑和水捏制而成的一种食物),伴以金刚神舞,在康宁寺举行,驱魔禳灾、辞旧迎新。

②城区主寺康宁寺在每年年底都会举办大型法会,俗称念大经,对人们这一年为寺庙所做的供奉与布施表示感谢,也为众生祈福。

③聂洼鲁,意思是全城的火供,一年一度在康宁寺举行,标志着一年完全结束,为全城来年兴旺“添火”。

外泼水,免财产外流,忌吃药,免一年生病,忌说不吉利的话,忌借钱和借东西,忌打坏东西或打倒东西;倒茶倒酒几分满、用哪只手、从什么方向,都有规矩;婚礼和葬礼的相关禁忌更是详细无比,不容违反。此外,巴塘藏语中有大量汉语借词,也是源自早期汉族移民,而汉姓、藏名更是寻常,因为城区绝大多数家庭往前数代都是汉藏通婚,汉姓随着家谱记载和家族记忆延续下来,成为现在巴塘人所说“带姓的”,诸如“张扎西次仁”“林扎西”等名字尤为常见。

#### 四、持续性的文化交融与超越性的身份认同

经济交往和生计方式互补为外来汉族和当地藏族提供了共同生活的物质基础,通婚让双方缔结了更紧密的姻缘和血缘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们在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相互靠拢、彼此渗透,形成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正是基于生活层面的具体交往,抽象的文化交融才能够持续地推进,进而在情感和心理层面引发我者的认知,达成身份认同的灵活性和超越性。

##### (一)持续性的文化交融

如前所述,巴塘的汉族和藏族在饮食、节庆、风俗习惯、禁忌、语言等方面的特点已经反映出双方历史文化交融的状态。为了集中呈现这个过程细节,以巴塘关帝庙的变迁为焦点,分析“八十家汉商”如何基于神圣公共空间的构建,与当地藏族展开文化交融。

早期来巴塘的汉族多以经商为生,他们敬奉武财神关羽,组成“财神会”(又叫“汉商公会”),加强联络,推举会首,共同捐资,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集体办会。“财神会”将会费作为集体财产,可放债生息,入股经商,除办会花费外,还用于扶助会员中的孤老病苦者。早期“财神会”主要服务于外来的汉族,其功能透视出当时的汉藏交往主要是商贸往来,其他层面的交往很有限。

乾隆十三年(1748年),随着汉族移民数量大增,“财神会”的原有规模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会员联络驻巴塘的绿营官兵,协同外来商户,共同筹措,计划修建关帝庙。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历经近八年,关帝庙才修建完成。根据巴塘档案馆留存下来的修建关帝庙的《缘簿》,捐助的范围颇广,包括:(1)陕西、四川、云南等地的众多商号<sup>①</sup>;(2)粮务官员<sup>②</sup>;(3)驻藏大臣;(4)巴塘土守备、正副宣抚司及其太太;(5)巴塘主持喇嘛堪布、巴塘蜡卡活佛<sup>③</sup>;(6)巴塘本地藏族、理塘茶客;(7)绿营官兵<sup>[5]</sup>。由此可知,除外来商户、官兵、粮务官员等给予财力支持外,巴塘地方官、土司、寺庙、民众也都积极捐助,说明这一时期外来汉族与当地藏族的关系已经比先前紧密,宗教空间的建立得到了积极的支持。

同治九年(1870年),巴塘发生7.25级地震,全城房屋毁于一旦。震后,军粮府委员吴福同与汉商公会共商重修关帝庙事宜,得到川、康、藏各地官府的大力资助,同时,巴塘正副土司、各地头人、寺院喇嘛、当地藏族的资助力度更强。由于筹款顺利、施工迅速,仅四年,规模更为宏大的新庙就矗立起来,并由关帝庙改名为“川陕滇三省会馆”,还将格萨尔王作为护法神供奉其中,另供奉21尊度母画像,设煨桑炉、嘛呢杆。巴塘主寺康宁寺不仅在重修关帝庙时捐助钱物、派僧人出力,还在建成后派出两名喇嘛常驻其中,供养护法神格萨尔王<sup>[7]</sup>。在三月城隍会游城隍时,关帝庙还敦请康宁寺的僧人前去念经、火供、丢朵玛。当时汉藏通婚已经十分普遍,在早期,汉族或者汉藏通婚的后代一般会到关帝庙抽签算卦,而所谓纯藏族则去喇嘛寺打卦卜问。随着双方的不断交融,这种区分已经很模糊了,关帝庙和喇嘛寺都可以去。原本属于文化核心的公共宗教空间已经不再是一种“内向”

①《缘簿》上记录的商号有:悦和号、永盛号、恒有号、正昇号、永升号、万有正记、万有号、万源号、大顺号、永昇张记、悦和盛记等。

②包括巴塘、察木多(今昌都)、拉里(今西藏嘉黎)等地的粮务官员。

③巴塘蜡卡喇嘛是巴塘八大活佛的首席喇嘛,在当地僧俗中影响力很大。

状态,而是彼此交叉。巴塘的外来汉族摆脱了“外部他者”的“陌生人”形象,成为当地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完成了由外而内的身份转型,融入当地社会文化逻辑之中<sup>[18]</sup>。

1924年,康区政局陷入动乱,为利于自卫,经呈准地方官府,“川陕滇三省会馆”改为“华族联合会”,次年又更名为“西康巴安国民协进会”,凡巴塘男性不分民族,均可参加。1942年正式更名为“巴安协进会”。至此,其庙馆特征完全消失,成为新的政治制度下没有民族界限的地方性社会组织,参与巴塘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巴塘关帝庙历经数次变迁,生命戛然而止。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地各种宗教活动陆续复兴,大量寺庙恢复、重建,而关帝庙却一直未见复兴之势,“三省会馆”也没有重启的苗头。巴塘关帝庙的衰落和消失恰恰意味着汉族彻底融入巴塘。最初,他们为在异乡立足而建造庙宇等公共空间,相互团结以应对排挤,随着双方的全面交融,包括精神信仰的相互渗入,庙宇的“我群”象征功能逐渐弱化。简而言之,巴塘关帝庙的完整生命周期折射出巴塘汉藏关系逐渐紧密,最终以其衰落表征交融的完成。

## (二)生成性的身份认同

巴塘汉藏双方基于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以及姐妹会、青年会、同岁会等群体关系。这些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现代民族身份的一种超越,即使现在本地的“老巴塘”在自我身份认同上都表现出某种不确定性,无法给出清晰的边界。这种更为综合和灵活的身份认同,正是历史上长期共存、共生而形成的。

透过“八十家汉商”的形成以及关帝庙的变迁能够发现,早期的汉族移民借助同乡会馆加强团结,标示身份,而当他们与当地藏族实现社会文化连接之后,作为巴塘人的新身份认同随之生成,这是一种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具体来说,将不具备“天然凝聚力”的汉族移民和巴塘当地藏族整合为表征在“巴塘人”名称下的共同体,需要细化多层次的认同生成。这个复杂多元的认同体系是在相互叠加中不断生成的。首先是地域认同。外来者和本地人在同一空间相聚,他们分享生活智慧,在同一片土地上劳作、生活,外来者不断地“化外为内”,而本地人也努力地“转生为熟”,双方最终达至一种共享的“地方感”<sup>[19]</sup>,进而形成一种地域认同。这种感知和认同源自日积月累的共同生活实践,一旦认同形成,又会反过来强化人们在生活中相互靠拢。其次是文化认同。在汉藏两个群体的共处和交流之中,人们在生活习俗、婚姻、祭祀、仪式、节庆、宗教信仰等方面相互吸收与交融,形成一种复合性的文化特征,久而久之就成为其共同遵循的文化逻辑。再次,对于外来汉族来说,他们还有家族认同(原乡的家族史记忆以及与巴塘藏族通婚后新的家族)、社区认同(在经济交往、族际通婚、日常生活等层面与当地藏族形成的地域性社区)。对于当地藏族而言,他们要处理的是如何将外来者纳入地方社会。这是双方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的一体两面,正是基于空间跨越、社会连接、文化交融这一整体过程而历史性地达成作为“巴塘人”的共同体意象。最后也最关键的是民族认同。这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及20世纪的大规模民族识别有关,基于较长时段而逐步形成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巴塘人”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身份认同变革,民族身份的获得使其在国家语境之下,形成了对藏族、对中华民族、对国家认同的统一。

多重身份认同的形成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汉族进入巴塘多是政治和军事原因,而抵达巴塘后的本土融入却要依靠底层力量的具体生活实践。因而,情境性和灵活性的身份认同生成是一个统合了外部和内部、主观和客观的综合过程。巴塘的多重边界使其成为一个自然与文化交汇的通道,为多元民族群体互动提供了前提,在搁置分立、求同存异中不断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而“巴塘人”的身份确认和认同建构就是在此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动态的灵活的相对认同显现出文化的杂糅性与复合性,体现在不同民族群体交往交流过程中对具体生活实践和自我身份界定的认知,这是兼容他者的生存智慧和社会德行。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是为了消除差异,而是在一种文化复

合性<sup>[20](2)</sup>格局中智慧地将自我和他者关系进行结构化处理,从而形成相促相生的“生生”局面。

## 五、结论:作为复合性共生体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对巴塘汉藏关系的历史追溯可以看出,汉族在巴塘“在地化”的过程就是与当地藏族交往交流而最终达至交融的过程。其中存在着层级递进的逻辑,首先要实现多重边界的穿越,包括空间的跨越、生态位的并接,之后才能在经济交往和族际通婚等基础上实现日常社会生活的全面连接,并经由历史的叠合、积淀实现文化的交融和认同的超越。而正是在这样不断深入的递进过程中,原本时空隔离的不同民族形成了多维度的复合性共生体系。从政治层面看,巴塘历史上存在着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粮台粮务和巡抚衙门象征着中央政权的权威,土司和土官体系代表着地方政治力量,汉藏各自的寺庙体系是其精神内核与力量支撑,让他们能够达成政治治理上的共识。从生态角度看,汉藏原本呈现遥远隔离状态的生态位,基于空间跨越实现了连接,双方在互补和往来中实现经济层面的互利。相应地,他们对这片土地的共同依赖也使其在遵从自然、敬畏生命等方面不断达成深层观念上的统一,形成生态层面的共享。从社会生活层面看,经济交往、族际通婚、日常生活实践等使双方形成稳定且持续的业缘、亲缘、地缘等关系。从文化和身份认同层面看,正是基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具体交往,才能形成抽象层面的文化共融,进而在情感和心理层面消弭“我”与“他”的边界,产生了对共同身份认同的共情。

共识、互利、共享、共处、共融、共情是从具体到抽象、由浅至深的层级递进和多维叠加,最终形成复合性共生体系,彰显着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度、广度,最后达至交融状态。由此可以总结出多民族交汇地带民族共生的模式:第一步,跨越——空间的跨越,是对自然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等多重边界的打破与跨越;第二步,连接——经济交往、生计方式互补、族际通婚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生活的全面交织;第三步,交融——文化层面的杂糅,身份认同的超越,心理和情感方面的共情。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际上是民族共生从单维向多维的递进,从生活技术的共生跃迁到文化观念的共生,最终形成一种复合性共生格局,这种动态过程的不断调适和生成就是民族共生的整体逻辑,也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复合性共生体系的本质。

用共生理论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可以将微观与宏观、具体与抽象加以结合,还可以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体格局,其核心是在“生态—文化”体系的差异中建立起能够统合差异的共生体系。本文归纳的“生态—共生—交融”分析图式,强调基于生态视域和共生理论来研究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共生体系的动态性和生成性能够有效地将历史与现实加以关联,历史上各民族的复合性共生智慧对于当下更高效和契合地构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平台,以民族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美]马古利斯. 生物共生的行星——进化的新景观[M]. 易凡,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 [2] 袁年兴. 民族共生理论的构建——基于社会生物学的学术共鸣[J]. 岭南学刊,2009(5).
- [3] 胡守钧. 社会共生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 [4] 许宪隆.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与各民族的共生互补——兼论第二代民族政策[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 [5] 周智生, 缙晓婷. 藏彝走廊地区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演进机理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3).
- [6] 张晗. 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5).
- [7] 马喜梅. 族际通婚对滇西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调适与优化[D]. 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7.
- [8] 周智生, 陈静. 清末民初云南藏区多民族人口流动与族际共生[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6).
- [9] 马光选, 刘强. 民族关系的互嵌—共生模式探讨——对云南省民族关系处理经验的提炼与总结[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6(6).
- [10] 沈再新. 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到“共生互补”[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3).
- [11] 刘勇. 中华民族“共生”特质嬗变: 从自在到自觉[J]. 人民论坛, 2015(21).
- [12]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 [13] 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 巴塘县志[Z].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
- [14] 焦应旂. 藏程纪略[A]. 吴丰培, 编. 川藏游踪汇编[C].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 [15] 巴塘县城区八十家汉商的由来及其演变: 第23卷[Z]. 巴塘县档案馆(内部资料), 1983.
- [16] 江安西, 李明忠. 巴塘财神会的由来及其影响[J]. 巴塘志苑, 1985(4).
- [17] 石硕, 邹立波. 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 清代至民国时期巴塘关帝庙内涵之变迁[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6).
- [18] 翟淑平. 漂泊到融合——从巴塘关帝庙看汉藏互动下的身份认同[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18(4).
- [19] 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20] 王铭铭, 舒瑜, 编. 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责任编辑 李小凤】

## Crossing, Connecting and Blending as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aking the Sino-Tibetan Symbiosis in Batang,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AI Shu-p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Ethnic groups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strong endogenous survival wisdom and rich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long-term communication, forming political consensus, ecological sharing, economic common interest, social life coexistenc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mpathy. This complex symbiosis system is gradually generated, showing how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original isolation state cross multiple boundaries, realize multi-level connection, and form a nature-society-culture integration pattern in their common life. Multi-ethnic complex symbiosis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its dynamic and generative nature can effectively relate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symbiotic wisdom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history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how to build a realistic platform for ethnic exchange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more efficiently and coherently, and to buil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Symbiosis;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Compound Symbiotic System